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精英界谋求中日和平的一次尝试

□ 简 奕

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个颇具影响、研究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非官方国际组织——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简称太平洋会议）。1929年第三届会议召开时，中国精英们在这个平台上与正在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一辩是非，力图以理服人，避免战争爆发。最终结果却说明，只有道理、缺乏实力支撑是难以维护国家利益的。

（一）

1929年10月21日下午5点，沈阳青年会三楼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为张伯苓、苏上达、阎宝航等9名参会代表召开的欢迎会正在进行。傍晚，徐淑希等5名代表乘火车从天津抵达沈阳来到现场，气氛更为热烈。

这批代表全是知名人士：张伯苓先生是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著名教育家，徐淑希是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苏上达是商务印书馆经理，阎宝航是张学良至交、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他们即将渡海赴日，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等人会合，作为中国支会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欢送者莫不希望这批中国知识分子之翘楚在国际会议上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真面目。

相较欢送者的热情，代表们的心情实在沉重。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华步步进逼，1915年1月悍然提出“二十一条”，随后济南惨案、张作霖皇姑屯遇害接踵而至；日本在东三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违反相关条约规定，擅自在铁路专用土地之内行使行政权、军权、警察权，几乎使东三省成为国中之国。更令代表们心情压抑的，是阎宝航刚刚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手中获得的一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写给天皇的《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难道侵略中国已成为日本既定国策？代表们固然无法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但仍决定把《田中奏折》译为英文，在太平洋会议期间广为散发，推动国际社会阻止日本。

（二）

日本支会出席人员阵容强大，包括日本学者、教育家新渡户稻造、“满铁”前副总裁松冈洋右、外交史学家信夫淳平等300余人。面对中国代表预备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东三省等问题，日本人准备得极其充分，他们居然出版了一本书，声称：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经过日俄战争将满洲从俄国手中夺回，对中国利益极大；日本对满洲并无占据领土之企图。更有意思的是，日本代表小村俊三郎还提出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旁观者细细分析却发现，这提议只对强者有利，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猖獗于东北的满铁以及对东北经济的掠夺只会愈演愈烈。

无论日本人如何花言巧语，侵略中国、蚕食东三省的事实无法掩饰。因此，无论中国人、日本人，抑或其他国家参会人员，无不关注东三省问题。于是，预备会期间，大会特意把东三省问题安排至文化问题、外交问题之后，避免中日代表一开始就发生冲突。

冲突一定会来。10月28日，第三届太平洋会议正式开幕。在日、英等国代表演讲之后，中国代表余日章作《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中国与太平洋之关系》的演讲，他痛陈日本实施田中“积极政策”，在北伐期间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东三省易帜以及张作霖案。余日章是中国基督教领袖，信奉“人格救国之主张”，这番发言基于事实、语重心长。不过，日本代表怎么会承认余日章陈述的事实，他们的不满形于颜色，“起而质问”，旁人不得不为之“排解”，才“无事而终”。

既然要让各国代表明白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就必须承受与日本人的冲突。余日章等代表随即向各国代表分发材料、宣言以及200册《田中奏折》的英译本，矛头直指日本侵华野心。日本代表一概否认，屡屡抗议。松冈洋右甚至以退会相威胁。

不过，这仅仅是序幕。

（三）

在讨论“机械文明与传统文化之

接触问题”“中国治外法权撤废问题”等题目后，11月4日，大会终于开始讨论“东三省问题”。

中国代表首先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三省的问题源于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仍野心不死，特别是日俄战争日本夺取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后，得陇望蜀，侵略中国，主要体现在擅自设置邮局、在铁道附属地关东租界地之外行使警察权等等。这使得中日两国十数年来已进入战争心理状态。

日本代表在发言中，把日俄战争后夺取的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形容为“南满猫额大之地”（意思是像猫额头那样小的地方——引者注），“不过铁道附属地三百方英里与关东洲之一千三百方里而已”，不过，他毫不掩饰地说，日本在东三省的權利不止于经济，“吾人深信于经济的利益以外，尚有重大军事上之责任”。

双方争论之时，旁观者对中国同情之心日增，特别是日本代表引用美国资本参与墨西哥铁路建设旁证自己行为合理时，墨西哥观察者立即声明虽然美墨之间经济密切，但在墨西哥历年革命中，美国并未派军队保护也没有实施政治干涉，这与日本在东三省的行径不同。

纵然如此，日本代表还是不服。当天晚上8时，“满铁”前副总裁松冈洋右登台发言，居然把东三省经济发展归功为日本。中国代表徐淑希立即发言，抨击日本阻止中国开发东三省，举出日本阻止中国借用外资修筑东三省铁路、西原借款黑幕、攫取“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等一系列事实，揭露日本不仅不援助，而且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即使日本有援助中国的行径，但中国的代价又何其大。徐淑希质问道，日本“为援助中国乎？抑或破中国乎”？

徐淑希的演讲极其深刻，各国代表无不动容。松冈洋右“老羞成怒，欲再登坛与徐氏辩驳”，但时间太晚，未得许可。“日本方面大怒，讨论会有大破裂之势。”

11月5日，大会在三层楼之大客厅召开会议，徐淑希与松冈洋右再次论战。徐淑希简述昨天的观点。松冈洋右的发言达35分钟，声称日本维护

了东三省的治安，开发了东三省经济；东三省问题起于日俄战争，根源是中国无力保卫领土之能力；最后他声色俱厉道，当年日俄战争之时，日本就可以把东三省占为己有，还何须与徐淑希争论！

其实，各国代表对东三省的是非曲直已然清楚，无论松冈洋右如何咆哮，公道自在人心。问题仍然是，到底如何解决东三省问题？

日本代表提出的方案是两国政府设立调停委员会，同时极其阴险地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日本尊重东三省中国领土权，绝对不侵犯，二是中日现在各条约协定继续有效。这个意见的实质是迫使中国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延续其独占东三省之现状。

这如何可能？中国代表当然拒绝。

日本代表不以为然，声称“二十一条”纵然是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但只要中国政府签字就得遵守。

枉费无数努力，所有的中国代表都明白了，东三省问题“一无结果”。日本代表毫无诚意，所有的讨论，“卒至一无结果，事实上等于完全破裂，毫不能发现一共同谅解之点”。

11月9日，太平洋会议闭会。

（四）

这段历史令人感慨。

只懂国际规则是不够的。中国参会的代表们相当熟悉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他们以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为本，以西方通行的国际法规则为据，在国际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把批判的武器用到了极致，获得其他国家代表们的相当同情，可谓尽心尽责，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唯有国力强大才能使国际规则正常运转。1929年的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又军阀横行、内乱不已，这如何能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与中国平等对话，更遑论根据国际通行规则谈判。

近现代风云



意，并在其谢恩奏折上批曰：“朕即位以来，朝内的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虽是君臣，情同契友。”为表对张廷玉的赏识，雍正特立遗诏，以其“器量纯全，折诚供职”，配享太庙。在清两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张廷玉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汉臣，可见雍正对他的赞誉非虚。乾隆即位后继续奉其为汉臣之首，并特封三等勤宣伯，开清代文臣无战功而封伯爵之先例，可谓恩遇优渥。但他却能以唐代宰相郭子仪为楷模，位高不自矜，权重不自负，颇请进退之道，不图后世之名，以至于在皇皇五百多卷的清史稿中鲜有他功业的记载，但青史自为贤者留名。

中国古代官德



明代《千秋绝艳图》中描绘的谢道韞（右二）

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笔记代表作。该书共36篇，记载从东汉后期到南朝宋之间名人雅士逸闻轶事，是一部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中专门有“贤媛”章节，叙述超过常人的女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如何独立于世、见解独到、品行独佳、能力独有，为当时的冰冷政治增加了些许温情，也为后世女子树立了典范。

见解独到

在封建社会，夫妻关系虽然有举案齐眉之相亲相敬典故，却在多数场合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妻子不事交际、专职家事被誉为贤惠之举。更有甚者，许多人将祸国殃民的根源归结为“红颜祸水”。然而，在滚滚历史长河中亦有许多女子洞见卓然，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晋朝的庾希被权臣桓温杀害，作为庾希的弟弟庾友也受到牵连。此时，庾友的儿媳妇挺身而出，亲赴其伯父桓温家，被桓温掌门官拦住，她大声斥责：“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她最终冲入桓温家见到桓温，向桓温哭诉：“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庾友（字玉台）身体有疾，需人扶助才能行动，怎会叛乱呢？桓温在她有理有据、见解独到的劝说下赦免了庾友一家人。《晋书》记载王凝之妻子谢道韞“聪明有才辩”。《世说新语》中记载谢道韞对谢玄说的一段话：“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一点也不见长进，是一心注意世俗杂务，还是本来就天赋有限？”淝水之战中名扬于世的谢玄，有着青涩的少年时光，谁曾想到谢道韞对其深深指责背后寄予的重托。从谢道韞的见识中可以看出，她的聪明不仅在于诗词文章，更在于对社会人生的卓然体悟。这种卓然体悟，一方面是谢家家族文化教养熏陶之使然，另一方面有、是其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认识与思考的结果。

品行独佳

晋朝名将陶侃出身寒微，由于战功显赫而被授予重任。他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晋书》记载当代出现了政治清明的盛况：“政刑清明，惠施均治，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他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并且以德化为己任，教化僚属，营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朝野用命，移风易俗”，百姓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中受益良多。

陶侃为何能成为一名名将名臣，关键在于他的母亲在他从政之路上的悉心指导、及时点拨，终使之成事。《世说新语》记载陶侃少年时，“作鱼梁吏”，担任监管鱼梁的小吏，借用职务之便运用公款，“尝以坭鱼乍餉母”，托人给母亲送去一罐腌鱼。按照常理推断，所腌之鱼虽然不值钱，即使用公款买之，在封建社会中，将其送给自己的亲友，实是小事。但是陶侃的母亲在见到这份礼物后，“封鱼乍付使”，封存腌鱼交付使者送还给陶侃，并且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从小事之轻微，看大节之重要，陶侃母亲作表率，为陶侃从政廉洁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造就了陶侃之后的成就。陶侃之母在小

魏晋风度中的贤媛们

□ 石 志 刚

事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见识和行
为，令人尊重。

能力独有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共的女儿阮氏才华卓异、品德高尚、能力超强，但是相貌丑陋，后许配给许允。新婚之夜，许允认为阮氏太丑而“无复入理”，许家深为此忧。此时，许允好友桓范来看望许允。得知桓范到访，作为新娘的阮氏在新房中对婢女说：“无忧，桓必劝之。”桓范果然与许允深聊，告诫许允“卿宜察之”，要与阮氏深度交流才能发现适不适合自己。许允听从了桓范之告，转头进入新房，等到他看到新娘阮氏的时候，还是认为阮氏太丑，目不忍看，“即见妇，即欲出”。阮氏看到此情景，拉住许允的衣襟让他留下。许允无奈之下不经意间问了阮氏一句话：“妇有四德，卿有几几？”阮氏回答说，我除了容貌不佳之外，其他三德都具备，进而反问许允作为读书人具备什么品行。许允说美德“皆备”。阮氏说：“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具备？”许允非常惭愧，从此对阮氏非常看重。

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阮氏的能力不仅在当时代诸女子之上，更让许多男子失色。许允担任吏部郎的职位时选用人才大多数是他的同乡，被魏明帝发现后欲将其治罪。此时，许允的妻子阮氏对许允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等到许允被押解到魏明帝跟前，按照妻子的吩咐，向魏明帝如实说理，告知魏明帝自己任用的人才尽管有同乡之谊，但都是根据职位与人才是否匹配才任用的。魏明帝经过调查后发现，许允任用的这些人才都很称职，于是不仅没有逮捕许允，而且还下令赏赐了他。当许允被带走之时“举家号哭”，阮氏说：“勿忧，寻还。”不几日，许允就回来了。这表明了阮氏对丈夫行为预判的结果是自信的，反映出阮氏的超常见识。夫妻关系不仅是婚姻共同体，而且还是思想共同体。好的思想、卓越的能力能够彼此交通。阮氏难道不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许允，为许允的成长提供了良好镜鉴，进而在史书中传名、成为贤媛的典范吗？

人物志

□ 王兆贵

提起张廷玉，知情者多半会联想到“六尺巷”的故事。其实，修书劝家人退让宅基地的是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时任礼部尚书。有道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到了张廷玉考中进士，入京做官后，家学与家教在他身上传承得更出色。因其“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居官五十年，历经康熙乾隆三朝，开文臣封侯伯之先例，而且是清廷汉臣唯一配享太庙的人。直到今天，人们仍称他是史上最成功的秘书型人才。

这里所谓秘书型人才，并非指单一的文秘，仅仅是起草发布文告，承担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二传手，还包括执行力与创造力兼容并包的品格与智慧，属于复合型人才的花萼。高素质的秘书型人才，在过去和今天都很紧缺。

张廷玉考中进士后，确曾以文秘见长而被重用。他理解口谕之准，起草文书之快，无人能出其右。雍正即位之初，“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张廷玉数刻拟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才思敏捷，文笔流畅，乃文秘人员的基本功，张廷玉不过是驾轻就熟而已，其从政素养是远在此之上的，否则，怎称得上集能贤于一身的“首席秘书”呢？张廷玉生病不能上朝，雍正问左右：“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雍正的措辞，听起来有些玄

虚和矫情，但也足以看出，他已把张廷玉视为自己的臂膀了。

办事勤勉，严谨缜密

西北用兵时，张廷玉“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傍晚回家，仍“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军情紧急时，每日常有百数十人抱牍案环立于旁等待批答，以至坐在肩舆之中也不得闲。即便如此，张廷玉也毫不懈怠，无一事出错或耽擄。雍正赞曰：“尔一日所办，在他入十日所不能也。”张廷玉记忆力很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甚至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但却心思缜密，与督抚外吏几乎没有书信往来。雍正对他信任有加，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未曾走漏一丝风声，就连被他举荐的人也不知情。

建章立制，创新行政

雍正七年（1729年），西北军情紧急，为便于及时处理，清廷“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后改称军机处。张廷玉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后，对这一机构的职能、制度以及奏批方式，进行了有效简化与规范，使之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中枢。张廷玉开创的“廷寄”谕旨之法，比明发上谕更

以身作则，清廉自守

当一个人对身外之物毫不动心，任是金刀银枪也奈何他不得。张廷玉位高权重，想要讨好他、巴结他的人比比皆是，但他却不置私产，甘守清贫，慎始慎独，一以贯之。雍正念其劳累、清苦，赏银两万两，张廷玉也感恩不受。实在推辞不过，就用来资助公共建设。

长子张若霭精于翰墨丹青，经常出入内府鉴定字画。一次，张廷玉在僚属府上看到一幅名人山水古画，惊叹难得一见。孰料没过几天，这幅画竟然挂在张若霭的书斋中。尽管是人家投其所好相赠，张廷玉还是拉下脸来“冷嘲热讽”。若霭连忙跪地谢罪，随即完璧归赵。张廷玉主政吏部期间，有个同姓书吏，经常在地方奏章上做手脚勒索钱财。因他朝里有靠山，地方上得罪不起，只能背后骂他“张老虎”。张廷玉得知后，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将其撤职查办，被人誉为“伏虎侍郎”。

公忠体国，明哲进退

张廷玉29岁点为翰林，33岁入值南书房，45岁擢礼部侍郎，50岁升礼部尚书，累迁至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平步三朝，深受倚重。他回老家祭祖，雍正特赐如